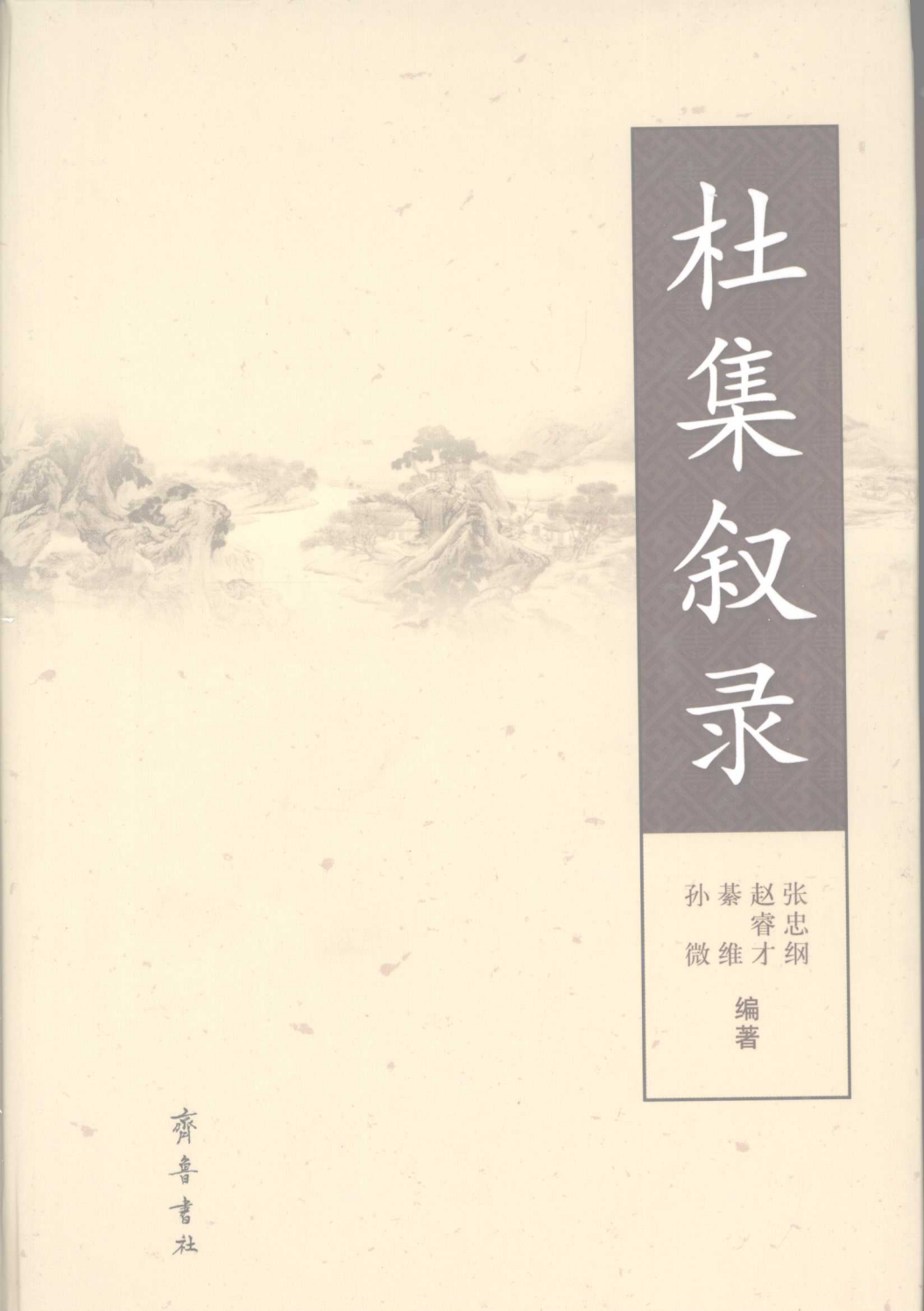




杜集叙录

孙綦 赵忠
微 睿 才 纲

编著

齊魯書社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杜集叙录

孙基 赵睿 张心
微 维 才 纲

编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集叙录 / 张忠纲等编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10

ISBN 978-7-5333-2111-6

I. 杜… II. 张… III. 杜诗—文学研究—专题目
录 IV. Z88: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0850 号

杜集叙录

张忠纲 赵睿才 蔡维孙 微 编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 32

印 张 27.75

插 页 3

字 数 7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111-6

定价: 79.00 元

杜

集

叙

录

前 言

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还没有哪一个诗人的集子像杜甫诗集这样让后人如此重视。前有唐宋人的纂辑、校勘、整理，后有历代学者文人的选注、评点、笺释、疏解，对杜诗的整理研究可谓代代更替，踵武不绝，且异彩纷呈，成果累累。这些有关杜诗的文献著述，卷帙浩繁，体式多样，特色各异。自唐迄今，历代杜诗学文献不断累加，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成为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目前“杜诗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研究者日众，研究内容也日益广泛深入，这都是令人感到振奋和鼓舞的。因此更好地整理继承这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作为一门学科最基本的材料，从唐宋迄今，杜诗学相关文献到底出现过多少？其中哪些已经失传，哪些尚存，存于何处？对现存杜诗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情况如何？对那些失传的或者存佚不明的文献，我们通过什么线索能够考知其大致情况，或者用什么样的辑佚方法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这些问题可以说一直困扰着整个杜诗学界。因为对杜诗学文献材料的充分了解不仅关系到我们相关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也制约着我们对学术发展史的宏观判断与微观定位，因此也制约着我们进一步前进的研究步伐。可以说随着杜诗学研究

的不断深入,这种对杜诗学文献总体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细致把握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这个基本文献的家底如果不能搞清楚,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极有可能是盲人摸象、臆解耳食。那么目前学术界对杜诗学文献的研究总体上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954年,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组编的《北京图书馆馆藏杜甫诗集书目》(北京图书馆1954年油印本),是国内较早编订的杜诗学文献目录,该目收杜甫诗集81种,92部,有关图书2种2部。1956年,浙江省图书馆油印了《浙江图书馆馆藏杜诗书目》,收杜诗65种,96部,每书均有简要解题。同年,成都杜甫草堂也油印了《成都杜甫草堂所藏杜诗书目》,此目于1958年12月重编,1959年又在此基础上纂成《增补目录》。该目共收成都杜甫草堂所藏杜诗学文献163种,470部,3800余册。现存杜诗学文献的概貌,已约略可见。1958年,陈炳良在香港《文学世界》杂志春季号发表《杜诗书目汇编稿》一文^①,收录了自唐至清有关杜诗之书共148种。1962年《文学评论》第四期发表了万曼《杜集叙录》一文^②。此后,中华书局于1963年出版的《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中收录了马同俨、姜炳炘二人编纂的《杜诗版本目录》。此目相对较为简略,所著录的亦都是见存文献,可和其他书目互相补充。1965年,香港叶绮莲所作硕士论文《杜诗学》下篇为“杜集书录”,以编年方式排列了由唐至清末之杜集。该目的编纂,参考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

① 陈炳良此目笔者未见,所论参见陈少芳《一九四九年以后香港杜甫研究概况》,载《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2期。据陈文,作者“陈炳良”,或作“陈炜良”。

② 万曼此文收入中华书局1963年版《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后收入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集叙录》。

杜

集

叙

录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京都大学文学部汉籍分类目录》、马同俨、姜炳忻《杜诗版本目录》以及香港大学所藏杜集等。^① 1967年1月,台湾大学研究所的梁一成又编纂了《杜工部关系书目》,并由其父梁容若校订完成。^② 该目共收书316种(包括欧美日本的相关著述),均为见存文献。据该目《例言》称,此目录参考了草堂所编书目。1970年,台湾《书目季刊》夏、秋、冬季号连续刊载了叶绮莲《杜工部集关系书存佚考》(上、中、下)长文,当即其硕士论文之“下篇”,对许多杜诗学文献的存佚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辨。^③ 1977年,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4期刊载了陈香《杜诗研究书目的梳理与提要》一文。成都杜甫纪念馆于1981年至1984年,连续七期在《草堂》杂志上刊载《杜甫纪念馆馆藏杜集目录》。编者在目录后称,此目收录文献的下限是1962年,因之此目较1959年的《增补目录》更为详备。1998年12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丁浩《书海拾贝——杜甫草堂馆藏精品版本卷》(《杜甫草堂历史文化丛书》之一)一书中全文收录了《杜甫纪念馆馆藏杜集目录》,与《草堂》刊载的《杜集目录》完全相同。此外,国内各大图书馆及个别学者也曾自行编纂过一些杜集文献目录。如《南京图书馆馆藏李白杜甫诗文集及研究两家的著作善本临时书目》、《西南图书馆馆藏杜甫诗集目录》、贺昌群《收藏杜诗书目》等。值得注意的是,港台学者对杜诗学文献梳理工作用力较大。而杜甫草堂纪念馆编纂的

① 叶绮莲此目笔者未见,所论参见陈少芳《一九四九年以后香港杜甫研究概况》,载《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2期。

② 1978年7月《书和人》杂志又发表梁一成编《杜工部诗集与年谱书目》一文。

③ 此前《书目季刊》1969年秋季号曾刊载叶绮莲《杜工部集源流》一文,当即其硕士论文之“上篇”。

杜

集

叙

录

杜集目录,在诸家书目中较为完备。这都为此后的杜诗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1986年,两部杜诗学文献目录的专著几乎同时出版问世,标志着杜诗学文献目录学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两部专著即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四人合著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9月版)和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版)。《杜集书目提要》和《杜集书录》是二十世纪收集、整理杜集书目方面最为权威的两部著作,屡为学界称道和征引,代表着这一时期杜诗学文献目录研究的最高水平。《杜集书目提要》的著者从1978年开始遍访各地收藏的杜诗学文献,历经八载方最终完稿。其中“知见书目”收书355种,不同版本446种。“著录存目”部分共列已佚或存佚不明文献221种,“集杜书目”收录文献28种,“戏曲电影”收录12种,“外文译著”,介绍日、英、德、意、俄、匈牙利、越南等外文译著42种。提要内容,先简介著者生平、著述,其次撮述该书内容、体例、特点、成书过程、版式及刊刻流传情况等。该书著者对一些杜学著作之间的传承关系多有辨析,对前人著录有误的一些杜集的版刻时间也都注意加以辩正,体现了著者的功力和识见。著名杜甫研究专家陈贻焮先生指出:该书著者博览群书,广为搜求,对所见到的每一版本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诸如版本的刻印流传、不同版本的比较、评注的短长得失、抄袭作伪之情等等,或寻流溯源,或抉幽阐微,或辨误纠谬,或详加评鹭,无不言之有据、论断精当。尤其对一些重要的评注本,不但详介版本情况,还简要地评价了其学术价值以及在杜诗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所有这些,对学人全面掌握杜甫研究概况,或挑选有关参考资料,都是很有帮助的。①

① 陈贻焮《〈杜集书目提要〉评介》,《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杜

集

叙

录

《杜集书录》的著者周采泉以一己之力,积数十年之功撰成《杜集书录》一书,初步汇集和总结了历代杜诗学文献的概况,是一部较为精审全面的杜集工具书。论者指出,此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网罗文献,巨细毕收。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不论书之存亡,悉加搜辑。特别是一些稿本、名家批点本、善本秘籍等世人罕见者还酌录原文,以备考索、研究。二、考订详赡,评论要赅。书中所加大量按语,均非泛论和拾人唾余者,皆自出机杼,确有见地。^①

如今距离《杜集书目提要》和《杜集书录》的出版已经过去22年,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上述杜诗学文献书目也日益暴露出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亟需完善和修订。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收录杜诗学文献尚不全面。由于《杜集书目提要》和《杜集书录》两书几乎同时问世,各自独立成书,没有能够相互补益借鉴,体例和风格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二书所收杜诗学文献数字不一,互有异同,其中每一种书目都不能囊括杜诗学文献的总体情况。但由于二书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若能在原书的基础上重新梳理纂订,取长补短,则单从收录文献的数字而言,即可更加接近杜诗学文献的实际状况。另外,除了二书所收之外,未被收录的杜诗学文献尚多。在我们长期的搜检过程中,就不断发现上述书目均未予收录的大量杜诗学文献,数目已不下几十种。如《樗叟诗杜拾遗》、李延大《李杜诗意》、刘格《淑少陵初言》、汪枢《爱吟轩注杜工部集》^②、杜濬《杜陵七歌》、闵麟

① 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957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杜集书目提要》第269页只是著录了汪枢《杜工部集》二十卷,然著者未见原书。

杜

集

叙

录

嗣《闵宾连集杜》、方迈《和杜哀吟》、郑光时《杜诗心解》、史纪事《摘杜诗衬》、王邻德《睡美楼杜律五言》、戴炳骢《璞庐杜诗选》等。当代学者对此也续有发现,如蒋寅《清诗话考》中,就著录了酸尼瓜尔嘉·额尔登尊《一草堂说诗》、郑同甸《评杜诗》等^①。这些被遗漏、忽略的杜诗学文献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搜采。而将这些陆续发现的杜诗学著作补辑入文献目录中去,也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也就是说,目前学界还缺乏一个相对完整、令人完全满意的杜诗学文献书目,故极有必要全面整理研究这些存佚的杜诗学文献的总体状况,按照时代先后整理出一个相对完备的书目,做到摸清家底,为进一步研究杜诗学演进、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献基础。

第二,《杜集书目提要》和《杜集书录》中著录的杜诗学文献,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一些失误,因而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甄别、考订和整理。归纳起来,存在的讹误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重收、误收。《杜集书目提要》中收录的杜诗注本有重复收录的现象,如该书《知见书目》部分有龚书宸评注《赏音阁杜诗问津》,《著录存目》部分又予收录,书名作《杜诗问津》。又如《著录存目》中所著录的《杜诗蕞评》,称“见张鉴《冬青馆乙集·杜诗蕞评序》”,此书实即《知见书目》所著录的刘濬《杜诗集评》。张鉴《杜诗蕞评序》与《杜诗集评》之陈鸿寿序,文字稍有出入,则《杜诗蕞评》当为《杜诗集评》之别名。《杜集书目提要》中还有将宋人著作误为明人者,如《著录存目》中所著录的阙名撰《杜诗发微》,实即宋杜旂撰《杜诗发微》,一作《杜诗发挥》。又阙名撰《杜诗节斋解》,实即宋侯仲震撰《侯氏少陵诗注》。侯仲震,字伯修,号节斋。宋眉山(今属四川)人。绍熙元

^① 蒋寅《清诗话考》第98、13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杜

集

叙

录

年(1190)进士。官至绵州太守。魏了翁特为作《侯氏少陵诗注序》。晁堧《宝文堂书目》著录为《侯节斋杜诗解》。又有将明人著作误为清人的情况,例如郑日强《杜诗注》、赖进德《李杜诗解》、陈懋仁《李杜志林》等。《杜集书录》亦存在重收、误收现象。如清乾隆间沈寅、朱崑补辑《杜诗直解》,《杜集书录》即误为明人著作。《集杜诗钞》的著者齐图南,误署为其兄“齐召南”等等^①。

(二)书名之误。《杜集书录》中著录书名失误之处较多,如将明代吴思齐《跋杜诗集》,误作《杜诗跋》;刘逵《唐诗类选》,误为《杜诗类选》;清代傅山《杜遇馀论》,误作《杜还馀论》;杨天培《西岩集杜稿》,误作《集杜诗》;和瑛《杜律》,误作《杜律选》;赵澐《杜诗评注》,误作《读杜评注》;凌賡臣《杜诗考注》,误作《杜诗考证》;钱泰吉《杜诗摘句》,误作《杜诗扎句》等等。

(三)卷数之误。如陈讷《读杜随笔》共分上、下二卷,每卷又分两小卷,《杜集书目提要》因此误录为四卷;又如汪文柏《杜韩诗句集韵》分上、中、下三卷,卷上又分上、下,卷中、卷下又各分上、中、下,《杜集书目提要》误录为“二卷”。

(四)其他失误。《杜集书目提要》、《杜集书录》二书中,还存在将一书著录为两书,一人著录为两人之类的失误。如元代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高儒《百川书志》、晁堧《宝文堂书目》、阮元《天一阁书目》等皆有著录,书名作《杜诗选注》。因国内早已不见原本,且《天一阁书目》录作董益撰,二书遂将董益、董养性视为二人,并将董养性视为山东乐陵人,将其书视为两书,实误。董养性,名益,自号高闲云叟。江西乐安人。所撰

① 齐召南亦有集杜之作,名为《集杜诗》而非《集杜诗钞》。

杜

集

叙

录

《杜工部诗选注》卷前自序末署“岁在丁未十一月日临川之高闲云叟董益养性叙”。丁未当为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同治)乐安县志》卷八《人物志·文苑》董养性小传云:“董养性,流坑人,居家孝友,学贯经史。洪武间应通经名儒,征授剑州知州,赴任几八千里,惟一僮自随。居官简静,惟修廨舍与学校,暇则哦诗缀文以自乐。所著有《书易题断》、《李杜诗注》,其生平诗文名曰《高闲云集》,藏于家。”则其应生活于元末明初间。《高闲云集》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然将此董养性与清初山东乐陵撰《周易订疑》之董养性混为一人。后人不察遂致误。又如张孚敬(1475—1539),原名璫,字秉用,号罗峰,永嘉(今属浙江)人。《明史》有传。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以迎合世宗朱厚熜尊生父兴献王为皇帝事,得帝欢心,不次擢用。嘉靖十年(1532),以名犯御讳,请更,乃赐名孚敬,字茂恭。先后历南京刑部主事、兵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官至大学士,卒谥文忠。著有《喻对录》、《奏对录》、《保和冠服图》、《张文忠公集》。又有《杜律训解》二卷,明代颇为风行,今已佚。明赵琦美《脉望馆书目》著录:“张罗峰《杜律释》。”晁瑛《宝文堂书目》著录:“《杜诗释义》,张罗峰注。”不著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张璫《杜律训解》,二卷。”书已佚,但尚有张氏《杜律训解序》、《再识》及《进〈杜律训解〉疏》存于《张文忠公集》中,故应以《杜律训解》为是。而《杜集书目提要》于《杜诗释义》提要云:“张罗峰,明人,生卒年不详,万历时在世。”又于《杜律训解》提要云:“张璫,字秉用。”不知号罗峰,遂将一人误为二人。再如明代《杜诗三百篇注》,《(光绪)乐清县志·经籍志》著录,题作“黄淮集,范观著”。据黄淮《黄文简公介庵集》卷六(黄淮集曾重编,卷六即原卷之十)《一斋范处士墓碣铭》,范观著有《一斋集》、《注杜诗三百篇》、《考订历代纪年图》,藏于家。黄

杜

集

叙

录

准或为之刊刻注杜一书,故《(光绪)乐清县志·经籍志》著录如上。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亦著录是集,并小字注“《黄介庵集》卷十”,乃是言其所据,周采泉遂误认为是集载于《黄介庵集》卷十,实误。

第三,杜诗学文献著者生平情况的考证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杜集书目提要》、《杜集书录》二书中,对许多著者生平情况的介绍都不尽如人意,甚或付之阙如。对这些著者缺乏了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由于资料匮乏,其中很多著者的生平已经难以稽考,但还有许多情况是由于著者投入的研究力量不够造成的,兹举几类如下:

(一)著者生平失考。《杜集书目提要》、《杜集书录》中有许多杜诗注本的著者,编者都称生平事迹不详,其实这其中有许多著者的生平是可以考知的,甚至这些撰者中有好多还是当时的名人。如清代朱琦的《杜诗精华》,《杜集书录》未收,而《杜集书目提要》虽著录其书,但对著者只字未做介绍。按清代见于记载的,至少有五个朱琦。而《杜诗精华》的著者朱琦(1716—?),字景韩,号复亭,又号笕谷居士。清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乾隆九年(1744),中顺天副榜第五名,十二年中顺天乡试第八名。曾官彭县、安岳知县。著有《杜诗精华》六卷、《倚华楼诗》四卷、《铁峰集》一卷、《倚云楼诗》四卷等。生平事迹见山东省图书馆藏《历城朱氏历科硃卷合订》。《杜诗精华》六卷,署笕谷居士手抄。系乾隆时抄本,现藏山东省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又如《杜集书目提要》中著录《杜诗字评》的著者董文涣,称其“生平未考”。^①据考,董文涣(1833—1877),原名文焕,字尧章,号研秋,一号研樵,亦作岷樵,山西洪洞人,咸丰六年(1856)

^① 《杜集书目提要》第270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进士。著有《岷樵山房诗集》十二卷、《藐姑射山房诗集》二卷、《孟郊诗评点》二卷、《声调四谱图说》十二卷、《集韵编雅》十卷等。又如《红萼轩杜诗汇二种》的著者孔传铎，《提要》称其“生平不详”。^①据考，孔传铎(?—1735)字牖民，号振路，山东曲阜人，雍正元年(1723)袭衍圣公。工诗，著有《申椒》、《盟鸥》二集。亦善词，著有《红萼词》二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三、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一三、《晚晴簃诗汇》卷五〇、《全清词钞》卷九等。又如《杜诗培风读本》的著者、《杜解通元》的校录者席树馨，《提要》亦失考，《杜集书录》将著者误作“叶树馨”，称“始末待考”。^②据考，树馨，字枝山，又字鹤如，怀来(今属河北)人。道光十七年拔贡，中咸丰三年(1853)吴凤藻榜进士，历任四川长宁知县。在任修书院，设文学，请名师，教士子，人文俱兴，为诸邑之冠。著有《代笺录》、《古文文笔》、《金丹选注》。生平事迹见《怀来县志·科第》。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此不备举。

(二)著者生卒年考证之失。《杜集书目提要》、《杜集书录》对一些杜诗学者的生卒年考证也存在许多问题，亟需加以订正修改。如《辟疆园杜诗注解》的作者顾宸，《提要》称其“生卒年不详”。据《锡山书目考》卷四，顾宸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六十八，当可据。《乐句》及《杜诗律》的作者俞场，《提要》中亦不详。而据《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载，明崇祯十七年(1644)，吴江俞场(犀月)生。另据《秀野草堂诗集》卷五载，俞场卒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五

① 《杜集书目提要》第271页。

② 《杜集书目提要》第138、222页。《杜集书录》第4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杜

集

叙

录

十一。又如《杜诗论文》的著者吴见思,《提要》称其生于明天启初年(1622)左右,未载其卒年。《杜集书录》阙载。许总称其生卒年为(1622—1685),不知何据^①。而据《毘陵名人疑年录》载,“天启元年(1621),武进吴见思(齐贤)生。”又同书卷一称:“康熙十九年(1680),吴见思死,年六十。”则吴见思之生卒年,似当以是为准。《杜诗阐》的著者卢元昌,《提要》称“其生平事迹不详”,而《东柯鼓离草》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华亭卢元昌(文子)生。”同书又称,康熙三十二年(1693)卢元昌尚在世,是年作《元日遣兴》诗,年七十八。则其卒年,当晚于是年。《杜诗义法》的著者乔亿,《提要》称其“约生活于清康熙、雍正时期”,《杜集书录》据《广陵诗事》称其生卒年为(1692—?)。而据乔亿《三晋游草自序》称,其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又据《游道堂自序》卷四,乔亿卒年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八十七,当以为据。再如《杜诗琐证》的著者史炳,《提要》称其“生卒年不详”,《杜集书录》阙载。据史炳《句俭堂集》卷二自称,其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其卒年至少应在道光十年(1830)以后,因为据《句俭堂集》卷四载,是年史炳年六十九,曾作《重修泾城碑记》。《杜诗笺》的著者汤启祚,《提要》称其“生卒无考”,《杜集书录》据《重修宝应县志·文苑传》称其为“康雍间人”。^②而《疑年录汇编》卷九称汤启祚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七十六,当可为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一一。

(三)名号之误。《杜集书目提要》中还存在一些将著者的

① 许总《论吴见思〈杜诗论文〉的特色及其对杜诗学的贡献》,《杜甫研究学刊》1983年第1期。

② 《杜集书目提要》第140、149、150、158、178、234页。《杜集书录》第177、499、616、396页。

杜

集

叙

录

名号颠倒混淆的失误。如《杜园说诗》(书名应为《杜园说杜》)的著者署名为“江田”,实应为梁运昌,因其号江田,故致误。严虞惇,号“思庵”,误作“思巷”。范廷谋,字周路,号省庵,误作字“省庵”。张雍敬,字珩珮,号简庵。误作“字珩珮,一字简庵”。江浩然,号孟亭。误作“字孟亭”。《杜诗补注汇》的著者沈元沧,误为沈名沧。《杜诗心会》著者署为“毛西原”,应为毛文翰。文翰,字彦祥,号西垣,又号西原。《尊道堂集杜诗》的著者署名“王子重”,应为王材任(1652—1739),材任,字子重。^①《杜集书录》一书中人名、字号出现舛误的情况也比较多。如《和杜诗》的著者王珩,误作“王衍”;《杜诗评》的著者朱铨,误作“朱经”;《杜诗考注》的著者凌赓臣,字以成,误作“字以末”;《少陵诗选》的著者田国文,字荆阳,误作“字荆扬”;《集杜诗》的著者陈光龙,误作“陈龙光”;《杜诗疏义》的著者王家瓚,字端臣,误作字“瑞臣”;《杜诗正》的著者邵志谦,误作“姚志谦”;《读杜慎言》的著者赵洵,误作“赵佃”,蒋寅《清诗话考》又误作“赵田”;《杜律含英》的著者任梦乾,误作“顾梦乾”等等。^②

此外,对文献著者生平事迹的记载中还有很多失误。如《杜诗择注》的著者张桓,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于乡,五十五年(1790)成进士,《杜集书录》误作“康熙九年(1670)进士”。应该说这类讹误极大地制约着我们对文献著者的了解和研究。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目前对杜诗学文献著者生平情况的研究还远未臻于完备,不仅存在大量错误,甚至还存在着研究的真空和盲点,亟需学者们着力进行考证,细致准确地理清著者的基本情况。

① 《杜集书目提要》第233、144、189、187、195、409、389、417页。

② 《杜集书录》第866、509、616、761、851、718、629、498页。

杜

集

叙

录

第四,关于杜诗学文献的一些结论尚需再斟酌考证。例如卢震《杜诗说略》一卷,书成于康熙八年至十二年(1669—1673)卢震任湖南巡抚期间。前有王封滌序,末署“赐同进士出身、通奉大夫、经筵讲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前吏部右侍郎、内阁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旧治年家眷侍生王封滌顿首拜撰”。据王封滌序署衔,王于康熙三十六年由礼部右侍郎转为礼部左侍郎,死于康熙四十二年,则是书当刊于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1697—1703)间。《杜集书录》谓此书为“明崇祯四年(一六三一)刻”,显误。又如应时《李杜诗纬》一书,《杜集书目提要》便将其归入“已佚或存佚不明”一类。其实该书并未散佚,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再如清初张笃行《杜律注例》一书,《杜集书目提要》认为张笃行生前未曾刻印,所据为该书卷四末张笃行玄孙张道存跋文:“是编予童时即得见之,不解读也。久藏篋中,迄今二十余年,始知先高祖一生精力苦心具见于此。幸逢盛世,诗学昌明,四方相与力追风雅。则是编也,或不宜私之一家云。乾隆己卯季夏月中浣,元孙道存谨书。”“乾隆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提要》编写者据此认为该书实刻于是年。其实此书在笃行生前即已刻印,只是由于系家刻本,流布未广,才让后人生此疑窦。《杜律注例》前有张笃行《题词》,署为“顺治己亥荷月”,即顺治十六年(1659)。孙殿起《贩书偶记》、《北京图书馆杜集书目》、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都著录有顺治己亥(1659)刻本。可见确有《杜律注例》顺治己亥(1659)的原刊本,而乾隆己卯(1759)为重刊本。《提要》据重刊本判断该书的刊刻年代,比初刻本整整晚了一百年。又如沈寅、朱崑补辑《杜诗直解》,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凤楼巾箱本。该本书名页误标作“乾隆乙未年新镌”,以后各家书目多沿其误。如《贩书偶记》著录:“乾隆乙未凤楼

杜

集

叙

录

精刊巾箱本,与《李杜直解》合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误标“清沈寅、朱崑辑,清乾隆四十年凤楼刻本”。《杜集书录》则误标“清乾隆丁未(1787)来凤楼刻”。《杜集书目提要》则误作“朱凤楼藏板,乾隆乙未(1775)刊”。由上述论析可见,当今学界对杜诗学文献版本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而这些问题

的最终澄清,都需要学者们作出更多的努力。

第五,收录杜诗学文献的体例和标准尚需明确和完善。诸种杜诗学文献目录甄录文献的数量不一,颇多差异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收录文献的体例和标准不同造成的。以清代为例,《杜集书录》收录存佚杜诗学文献多达 330 余种,而《杜集书目提要》收录 214 种,二者差距 100 多种。不过《杜集书录》所收 330 种文献的数字当中还包括 80 余种名家批校本。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杜诗批注本并不能算作严格的著作,虽然这些杜诗批注本中并不乏精彩绝伦的妙解和胜见,也构成了清代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那么若以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统计的话,则《杜集书录》实际所收清代杜集版本约有 230 余种,这和《杜集书目提要》收录的文献数字基本上是接近的。又如马同俨、姜炳沂编纂的《杜诗版本目录》,是从版本的角度著录杜诗学文献,该目录将同一种著作的不同版本或不同名家批校本都另立一条予以著录,如郑沅《杜工部集》就著录了七种,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著录了九种,杨伦《杜诗镜铨》著录了十种,刘辰翁评点本的不同版本更著录了二十余种。若从文献种类来看,其实同一著者的同一著作,无论有过多少版本或多少名家批校本,都应该只算作一种。因此,要对历代杜诗学文献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摸查排目,我们首先需要对收录文献的标准作一个基本的界定。本书所收杜诗学文献中,对同一种杜诗学著作的不同版本特别是重要版本都在同一条目内加以介绍。对于一些著名版